

在农村中大放大鸣大争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在農村中大放大鳴大爭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7年•武漢

在农村中大放天鳴大爭

*

湖北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武漢解放大道332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1號

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

江漢印刷廠印刷

*

787×1092 $\frac{1}{32}$ 開·3 $\frac{1}{2}$ 印張·79,000字

1957年10月第1版

1957年11月第2次印刷

印數：8,001—13,500

統一書號：T3106:68

編者的話

农村中的大放大鳴大爭，目前正在逐步开展，为了配合这一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們特将“人民日报”、“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最近刊载的、和尚未公开发表而由有关单位提供的一些关于合作社的优越性、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統購統銷、城乡工农关系、肃反和遵守法制等方面的专論和发言选編成册，以供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农村干部和农民在大辯論中作参考。

1957年10月

目 录

在农村中大放大鳴大爭·····	1
斥右派分子誣蔑农业合作化沒有优越性的謠言·····	7
粮食問題和思想問題·····	14
統購統銷对誰有利·····	18
湖北省几年来的粮食購銷是否合理·····	27
誰是农民利益的代表者·····	34
彭一湖替誰叫苦? ·····	39
駁右派分子对人民生活問題的恶毒攻击·····	44
从物价方面駁斥右派分子的謠言·····	52
城乡市場上两条道路的斗爭·····	59
今天武汉郊区农村的新面貌·····	69
在肃反問題上駁斥右派·····	76
斥右派分子对肃反运动的攻击·····	85
在法制和肃反問題上駁斥右派·····	96

在农村中大放大鳴大爭

我国农村已經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但是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没有結束。为了巩固社会主义的陣地，克服資本主义的傾向，在目前有必要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規模的社会主义教育。

1955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几亿农民爭先恐后地加入了高級农业社，并且随即掀起了生产高潮，在大灾之年增产粮食150亿斤。在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虽然有极少数人退社，同时却有更多的人入社。这些事实无可辯駁地說明：我国农民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已經得到偉大的成就。

但是决不能認為农业社一成立就会巩固起来。这种想法是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規律的。毛澤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的报告中已經指出：“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經過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經過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合作社正在經歷一个逐步巩固的过程，这个过程还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時間。

在合作社逐步巩固的过程中，需要同时在經濟战綫上和政治思想战綫上进行斗争。在經濟战綫上，要不断地发展农业和农村副业的生产，逐步地实现农业的技术改造，并且正确地解决分配問題，使社員的收入逐步增加。在政治和思想战綫上，

要教育絕大多數社員熱愛社會主義祖國，熱愛合作社的集體事業，不斷地提高社會主義覺悟，從根本上擺脫資本主義的影響，並且積極地同破壞社會主義的壞分子作鬥爭。在全國基本實現農業合作化以後這一年多期間，各地農村工作人員對於經濟戰綫一般比較重視，而在政治和思想戰綫上，工作卻顯然落後了，許多農村工作人員和農村的黨組織似乎認為，在合作化的任務基本完成以後，農村中再沒有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了，因而放鬆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工作。

這種想法是完全錯誤的。他們忘記了毛澤東同志的這些教導：“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綫，在社會經濟制度發生根本變革的時期，尤其是這樣。……一個嶄新的社會制度要從舊制度的基礎上建立起來，它必須清除這個基地。反映舊制度的舊思想的殘余，總是長期地留在人們的頭腦里，不願意輕易地退走的。合作社建立以後，還必須經過許多的鬥爭，才能使自己鞏固起來。鞏固了以後，只要一鬆勁，又可能垮台。”“富裕農民中的資本主義傾向是嚴重的。只要我們在合作化運動中，乃至以後一個很長的時期內，稍微放鬆了對於農民的政治工作，資本主義傾向就會泛濫起來。”（見“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中“嚴重的教訓”和“必須對資本主義傾向作堅決的鬥爭”兩文的按語）

事實正是這樣。在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思想鬥爭中止了或者削弱了的地方，反社會主義的力量就抬起頭來，大肆活動起來了。

不能忘記，農村中的地主分子和富農分子還正在被改造，要使這些人從思想到行動都變成社會主義的勞動者，無疑是一個長時期的任務。這個改造已經收到效果。但是一部分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同別的壞分子在一起，仍然在等待時機，反對合

作化，反对統購統銷，挑撥工农关系，扰乱社会秩序。今年6月上旬以前資產階級右派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期間，在一些农村里，就有一些坚持反动立場的原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乘机而起，恫吓农民，毆打干部，甚至公然企图倒算。很明显，如果对于这些坏分子不給以坚决的打击，我們决不能在农村中建設社会主义。

富裕中农，多数是愿意同貧农、下中农一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他們自愿地参加了合作社，可是許多人是“随大流”，并没有充分的自觉。实际参加了集体的生产活动和收益分配以后，他們不免感到自己多年养成的旧习惯同新制度有矛盾。农业社初办，生产和收入一般地一时还难于达到某些富裕中农原有的水平；一切新生的經濟制度都会遭到的困难，如物力不足、經驗不足等等，在新办的农业社里也是难免的。即使社里的生产显著地增加了，要把社里人同人之間的关系都处理得很妥善，也不是短时期容易做到的。于是，一部分富裕中农觉得在社里“受拘束”或者“吃亏了”。在处理国家、合作社、社員个人之間的关系問題的时候，少数富裕中农起了消极的作用。一小部分資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不顾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隱瞞产量，从事商业投机，破坏統購統銷，并且在合作社中散布錯誤言論，破坏社内团结，損害公共財物，妨碍劳动紀律，甚至鼓动社員退社。少数富裕中农在这些方面的活动，客观上助长了一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对于一般富裕中农，我們当然要从經濟上和政治上巩固地团结他們。但是，如果有人坚持錯誤，蓄意破坏国家的利益和合作社的利益，那就必須对这极少数人展开說理斗争，把他們的資本主义思想彻底駁倒。如果不系統地講清事实，辨明是非，伸張正气，压倒邪气，就达不到团结的目的。

大多數農村黨員和幹部是忠誠地為社會主義事業奮鬥的，他們是廣大農民所擁護的領導者。可是，有一部分農村黨員和幹部，包括一部分縣級工作人員在內，沒有認清農村中的階級鬥爭的形勢，沒有堅決維護社會主義的原則。這些同志在對象糧食問題這樣同社會主義的命運有極密切關係的重大問題上，錯誤地站到了個人主義、本位主義的立場上。有些同志，對於壞分子危害農村秩序、破壞社會主義法制的行為，採取了放任的態度，沒有及時地給以應有的打擊。

這些事實說明：儘管合作化運動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新事物同舊事物的鬥爭決不是一年兩年所能夠解決的，農村中的資本主義傾向仍然有不容忽視的影響。因此，十分必要向全體農村人口進行一次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批判黨內右傾思想和個人主義、本位主義思想，批判某些富裕中農的資本主義思想，打擊企圖向社會主義進攻的地主富農分子和別的壞分子的反革命行為。這是農村中的一場不可避免的重大的政治鬥爭和思想鬥爭。還要了解，這是一個長時期的鬥爭任務，決不是只進行這一次就可以解決問題的。這樣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應該每年進行一次。不然，就談不上社會主義革命在農村中的徹底勝利，談不上社會主義農業的順利發展，談不上合作社制度的日益鞏固。

這場鬥爭應該怎樣進行呢？已有的經驗證明：最好的方式就是有領導有計劃地在農村中，包括單千戶在內的全體人口中，展開群眾性的大辯論，也就是在農村中實行“大放大鳴大爭”。首先，把農村現實生活中的問題都揭露出來，讓各種不同的意見都發表出來，然後，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批判之，也就是堅決地充分地進行說理鬥爭，解決問題，改進工作。有人認為，這種大辯論的方式，在比較高級的機關里和學校里可以

采用，在农村不能采用。这是对于党的领导的力量和基本群众的智慧缺乏信任的表现。根据山西榆次、襄汾、洪赵等地和其他许多地方的经验，在上级党委的工作组和农村基层组织的共同领导下，在农村中同样可以采用大辩论的方式，而且只有采用这种方式才能最有效地解决问题。

辩论一些什么问题呢？根据目前各地农村情况看来，有关合作社的优越性、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城乡工农关系、肃反和遵守法制这四个方面的问题，在农民群众和农村工作人员的思想中特别需要澄清。因此，这四个方面的问题特别需要摆出来辩论。

在秋收以前，辩论应该首先集中在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统购统销问题上。这是当前群众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也是为了顺利地完成本年统购统销任务必须首先解决的一个问题。要使每个基层干部和农民都懂得：是否百分之百地完成粮食统购任务、严格地控制粮食销量和认真地节约粮食消费的问题，实质上也就是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爱国不爱国的問題。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合作化，不仅是为了农民的利益，而且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为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利益。任何时候，都不允许把个人的局部的利益同国家的整体的利益对立起来。目前在农村里发生的一个最尖锐的问题，正是一部分落后分子把个人利益放到了同全体人民的利益对立的地位。他们为了个人的利益，要求国家对粮食少购多销。收购的少，销售的多，拿什么填这个窟窿呢？拿什么去供应城市人口、工矿区人口和军队的粮食需要呢？拿什么去供应灾区农民、经济作物区农民和缺粮农民的粮食需要呢？当人人都需要节约粮食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怎么能够不带头节约粮食呢？他们认为这些是国家的事，他们不管。但是如果大家象这样自私自利，

还能不能建設社会主义呢？沒有社会主义的祖国，沒有全国的社会主义建設，还能不能有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幸福呢？显然是不能夠的。因此，粮食問題的辯論不但对于紧接着秋收的粮食工作有决定的意义，而且对于树立爱国爱社爱家必須統一的思想，对于树立勤儉建国、勤儉办社、勤儉持家的思想，有决定的意义。

在別的几个問題的大辯論中，也要緊密地圍繞着这个中心目的：教育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了解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的一致性，懂得勤儉建国、勤儉办社、勤儉持家的必要性。

在無論什么問題上，都要有充分的信心：信任党、信任群众。絕大多数农民群众同我們的党有血肉一般的联系。他們是愿意听共产党的話，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的。在这次大辯論中，只要加强領導，依靠基层組織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坚持依靠貧农下中农、团結中农的階級路綫，坚持用說理方法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針，坚持反革命必須肅清、坏分子必須打击的方針，一定能把农村中的資本主义思想斗垮，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

（1957年8月10日“人民日报”社論）

斥右派分子誣蔑农业合作化 沒有优越性的謠言

冀 晨 晞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我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农业生产工作，是在比較曲折的情况下进行的。在五年计划开始的第一年——1953年，遭受历史上少有的长期春旱，受旱严重的达49县，全省3 800万亩水田有150万亩被迫改种旱作，这年粮食虽稍有增产，而棉花歉收，形成平年。紧接着1954年遭受近百年来未有的大水灾，受灾地区达64县1个市，其中被淹80—100%的有10个县，受灾田地共2 300多万亩，占全省总耕地面积的36.5%，而且絕大部分为粮棉高产区，使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受到重大损失，造成灾年。这就是說，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間的头两年，我省农业生产的进展受到很大的阻碍，并給后三年农业生产的发展带来很多的困难。1955年，针对灾后特点，采取了一系列的有效措施，排除万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这年秋收以后，合作化高潮到来，农村生产关系起了根本变化，出现了生产高潮。于是，在实现合作化的第一年——1956年，获得了我省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丰收。1957年，在合作社进一步巩固和合作化的优越性进一步发挥的条件下，根据目前情况，有很大可能获得比1956年更加全面和更大的丰收。由于后两年生产的飞跃发展，因而保证了我省粮、棉及其他許多农作物的总产

量，接近完成或超額完成了国家第一个五年計劃指标。

目前，右派分子却异口同声地說“合作化沒有优越性”，恶毒地攻击国家对农村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这里我就用我省农业生产发展的具体情况，来彻底粉碎右派分子的瘋狂进攻。我們怎样衡量我省农业生产的巨大发展呢？我想最好用已經丰收的1956年同几个不同年度的生产水平来作比較。1956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208.8亿斤，比1952年增长27%，比1949年增长66%；棉花总产量可达388.7万担，比1952年增长45%，比1949年增长410%；油料总产量达到523.5万担，比1952年增长11%，比1949年增长35%；牲猪总头数达到499万头，比1952年增长11%，比1949年增长154%。其他各項生产同样有很大的增长。以上几个方面的比較数字，便有力地說明了我省农业生产的飞跃发展情况。

但是，大家都知道，如果不是实现了农业合作化，我省农业生产的发展是不会有这样快的。对于这个問題，我們还可以用1956年的生产水平同实现合作化前一年的1955年作一个比較：1956年的粮食总产量比1955年要增长11%；棉花增长33%；油料增长6.4%；牲猪增长46.8%；其他如大豆以及苧麻等特产作物，均增长40—70%。象这样大的增长幅度，是前所未有的，是空前的奇迹，也就是合作化巨大优越性的集中表现。

合作化到底是怎样促进农业生产的大发展？这个問題，如果千句話做一句話說來，那就是：一切有利增产的各項措施和耕作技术的改革，都是在合作化的基础上，才得到更加全面和更加深入的貫徹实现。我在这里打算从三个方面來說明这个問題。

首先是在合作化的基础上，全面实行了用計劃指导生产。这个問題，从全省600多万农户組成38 000多个合作社的这个

根本变化，就可以了解到合作化所給予我們运用計劃指导生产的无比优越条件。正因为这样，我省以“粮、棉为主，积极发展多种經濟”的方針，才得以全面而完整地貫徹。全省广大农业合作社，才得以实现以粮、棉、油等中心的全面增产。从而保證了全省农业生产做到有重点和全面发展相結合。例如：1957年粮食播种面积同1952年比較，将近扩大了10%，而在优先发展粮食的同时，棉花相应地扩大了3.5%，油料扩大了31.1%。其他各項經濟作物均有相应的发展。这里我們不妨回顧一下合作社以前执行国家計劃的情况，那时，我們曾經用很大的努力，想把小农經濟的生产納入国家計劃的軌道，虽然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然而，由于我們当时是面对数百万戶小农經濟，在不少計劃指标方面，終未能实现国家的要求。有些地方并且对于計劃規定很死，执行很严，这当然是工作中的一种偏向，但这些地方也并不能够完滿地实现国家計劃。但在合作化以后就显然不同了，我們是面向合作社，由于社会主义經濟的本身就具有計劃生产的特点，因此，虽然我們在执行国家計劃中，給了合作社一定的机动灵活的权利，但却能按比例如期实现国家計劃，并且能够做到国家需要和群众需要相一致，有些右派分子說我們“把合作社捆得太死了，农民生产沒有自由”，其居心就是否定合作化对于計劃指导生产方面所發揮的巨大作用，企图否定社会主义的經濟制度。

其次是在合作社的基础上，貫徹了以“五改”为中心的各項增产措施和耕作技术的改革。这里只打算談几个主要的方面，而这些，在合作化以前的农民是难于接受或者无力进行的，而在合作化以后都大踏步地向前迈进了。例如：把旱地改成水田，是可以显著增产的，但过去农民仅有梦想，无力实现，而在实现合作化以后的短短两年中，就改了90万亩，把許多农民的夢

想变成了现实。又如种植双季稻，过去限于水利、肥料、劳力等条件，仅沿滨湖地区的少数农民，为接夏荒而一户种植几分田的早稻，并且不一定都能复晚，现在合作社则作为一项重要的增产措施扩大种植，1957年全省种植面积，即比1955年扩大了两倍以上。近两年来进行的生产工具的改革，更充分证明合作化对于发展生产力所提供的有利条件，全省推广的各种大型新式农具，计有双铧犁64 200部，十行条播机2 500部，动力脱谷机300部。全省1 373台抽水机中，由合作社经营的就有902台合9 325匹马力。另外还有改良农具90种3万多件。所有这些生产工具的改革，对于节省劳力，促进增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这在过去农民单干时期，是根本无力办到的。合作化以后各种作物的良种面积扩大更快，1957年水稻良种面积已达到水稻总面积的66%，小麦良种面积达到62%，棉花良种面积达到82%。而1955年水稻良种面积还只占26.73%，小麦占11.12%，棉花占16.32%。也就是说，在实现合作化以后的短短两年中，水稻良种面积就扩大了1倍半，小麦扩大了4倍半，棉花扩大了5倍。还有山区的坡地改梯地，也同旱地改水田一样，是过去农民长时间梦想而无力实现的一项增产措施，但在两年中就改了45万多亩。上面所列举的几项一般的在原来的基础上，要增产1—3成，有的更多。但右派分子却抓住我们工作前进中难以避免某些缺点，加以全盘否定，其居心不外两点：其一，否定合作化对于实行技术改革所提供的无比有利条件，从而否定合作化的优越性；其二，攻击党不能领导生产和科学技术，企图从生产和技术方面取消党的领导。

第三是在合作化的基础上，胜利地进行了抗灾增产的斗争。近两年来，我省虽无特大灾害发生，但各种自然灾害仍然频频出现，而在这些发生过灾害的地方，只能说在实现了合作化的

农民面前，才沒有使其成灾。特别是1955年和1956年的冬播前后，普遍严重受旱，一般抗旱時間长达两个月到三个月，个别地区有长达四个半月未能解除旱象。在这种情况下，全省掀起了規模大、時間长、斗争頑强的抗旱冬播运动。許多地方的合作社，出現了使用水車数十节，叫“江水翻黃壩、湖水滾上山”的偉大場面。全省1956年經過大規模的抗旱斗争，基本上保證了冬播适期播种，并且一般还縮短了播种時間半个月到一个月。这个斗争的胜利，成为今年夏粮增产10%，油菜增产50%的主要因素。諸如此类的抗灾增产斗争，如果在过去农民单干时期，那是根本不敢想象的。可是右派分子却一笔抹掉广大农民胜利地进行的抗灾增产的斗争，說什么1956年的空前大丰收，完全出自“天老爷”的恩賜，其居心也不外是否定合作社集体力量的偉大，并且企图煽动一些对合作社不滿和有着保守思想的人們，同他們一起来否定合作化的优越性。

右派分子还异口同声地說：“农民生活沒有改善。”我們还是用鉄的事实来粉碎这种荒謬謠言。首先从粮食來說：1956年全省农民平均口粮在550斤以上，比1949年每个农民实际生产的548斤还是有超过。这就是說，1956年每个农民平均粮食比1949年每人平均生产的还多，仅这就足够說明随着生产的发展，农民的生活已有很大程度的改善。我們还可以从圻春新鋪乡前进社467戶社員的調查，具体看看农民生活的上升情况。1948年每人平均只收入25元，口粮450斤，吃油1斤半，用布1丈。到1956年，每人平均收入达到48.3元，将近增加1倍；口粮540斤，增加了20%；吃油4斤，增加1倍半；用布2丈7尺，增加170%。上面事实，証明农民生活并不是沒有改善，而是改善得相当快。我們再从鄂城杜山乡旭光一社的10戶社員的典型調查，进一步分析各阶层农民的生活上升情况。这10戶社員当中

的3戶貧农，1956年每戶平均收入，比1948年增加了2.6倍；3戶一般中农增加了两倍多一点；4戶富裕中农，也增加了将近1倍。这个材料說明，上升最快的是貧农，一般中农次之，富裕中农又次之。农村中有沒有生活下降的呢？有，那就是少数的封建地主阶级和富农分子。而这，正反映了共产党领导农民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的英明，偉大和无比正确。合作社之所以得到广大农民，特别是貧农和下中农的衷心拥护，其根本原因也就在这里。

以上种种事实，足以說明合作化有无比的优越性，农民生活有很大程度的改善。可是右派分子为什么硬說“合作化沒有优越性，农民生活苦”呢？他們是真的視而不見、听而不聞嗎？不是的。我們从右派分子的政治本質来分析，他們之所以大喊大叫“合作化沒有优越性”，这是因为，繼土地改革之后又实现了合作化，对于右派分子在农村所賴以生存的私有制度，和賴以統治剝削人民的资本主义經濟基础，被彻底地摧毀了。对于这，右派分子、地主和富农分子是不甘心的，因此就大肆攻击合作化。并且还因为，右派分子妄图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因此，尽管他們曾經举手贊成过宪法，表示拥护宪法总綱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可是当我们党领导人民取得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的决定性的胜利的时候，当工农联盟在实现农业的合作化的新的条件下得到进一步巩固的时候，他們却出来反对合作化了，叫喊合作化沒有优越性。实質上就是反对共产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右派分子又为什么口口声声說“农民生活苦”呢？这种阴谋也是一戳即穿的。他們是想用这种从外表看来是同农民站在一起为农民“訴苦”，实質上，他們是企图混淆人民視听，煽动农民来同他們一起反对